

东京市“奉迎”溥仪访日考述

A Study on Puyi's Visit to Tokyo

王彦嘉

Wang Yanjia

内容提要：

1934年3月，清室逊帝溥仪在关东军的一手策划下，于长春即“满洲国皇帝”位。次年4月，为表达对昭和天皇之弟秩父宫雍仁亲王参加其即位典礼的感谢，同时也为了进一步营造所谓“日满亲善”的政治氛围，溥仪正式出访日本，行迹遍布东京、京都、奈良和大阪等多座日本城市。日本政府出于笼络溥仪的政治目的，给予了溥仪极高的接待规格和政治礼遇，不仅天皇本人在东京车站亲自迎接溥仪，溥仪活动安排最为密集的东京更是在市政府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改建，兴修改造了许多和溥仪访问相关的道路和建筑。甚至专门成立了政府直属的临时性政府机构——“奉迎”事务机关。日本政府的殷勤表现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使溥仪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服务，而从溥仪回国后的表现看，日本政府的这一目的确实得到了基本实现。

关键词：

溥仪 访日 《“奉迎”志》

ABSTRACT:

In March 1934, Puyi,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Qing dynasty, assumed the throne as the so-called “Emperor of Manchukuo” in Changchun under the plan of the Kwantung Army. In April of the following year, to express gratitude for the attendance of Prince Chichibu, younger brother of Emperor Showa, at his coronation ceremony and to further foster the so-called ‘Japan-Manchukuo goodwill’ political atmosphere, Puyi officially visited Japan, traveling to multiple cities including Tokyo, Kyoto, Nara, and Osaka. To win over Puyi for political purpose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ccorded him a high level of reception and political honors. Emperor Showa welcomed Puyi at Tokyo Station, and the city of Tokyo, where Puyi's schedule was the most intense, underwent extensive infrastructure renovations led by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including roads and buildings related to his visit. A temporary government body—the Welcoming Affairs Office—was even established for this purpose. Ultimately, Japan's diligent efforts aimed to enlist Puyi's support for its interests in Northeast China, and from Puyi's actions after returning home, it seems this goal was largely achieved.

KEYWORDS:

Puyi, visit to Japan, reception record

一 研究综述

对清室逊帝溥仪在伪满洲国建立和发展中所起作用的探寻,长期以来是国内近代史和对日关系史的重要研究范畴,但长期以来,对于溥仪访问日本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学界前辈着墨不多,专文论述溥仪第一次访日的论文仅有刘建华的《简述溥仪第一次访日》¹,其对溥仪第一次访日的目的和经过进行了简要论述。此外溥仪研究会所办《溥仪研究》集刊也曾对溥仪此次访日的一些图片进行披露²。此外,王丽杰的《溥仪与裕仁1931—1945年间往来实录》³也对溥仪和裕仁十数年来的电报往来有所提及。但总体而言,前辈学人的研究甚少聚焦于溥仪在东京期间的具体活动。这也成为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一处小小空白。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National Diet Library)的前身之一是日本帝国图书馆,由于帝国图书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是接受缴送本的图书馆,故其藏书包括了明治以后日本出版的所有出版物,帝国图书馆的藏书成为二战后成立的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书的重要基础。馆内现藏有东京市政府于昭和十一年(1936)编纂的《“满洲国皇帝陛下”东京市“奉迎”志》(以下简称《“奉迎”志》)⁴和溥仪归国后编纂的《伪满诏书》⁵,二者均系缴送本,其内详细记录了东京市政府对溥仪访问的筹备工作和溥仪在日的逐日行程。笔者即以此二书作为基本研究材料,对溥仪第一次访日在东京市的活动情况和东京市政府组织的所谓“奉迎”活动进行论述和探究。

二 访日缘起



图1 1934年6月6日下午,秩父宫雍仁亲王到访伪满国都新京溥仪率伪满政府要员在站台迎接

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更改国体为君主立宪制,清逊帝溥仪即位为“满洲国皇帝”。3月19日溥仪派出伪满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和财政大臣熙洽前往东京向日本天皇裕仁表达对日方支持伪满国体变更的感谢。同年6月,作为回访,日本天皇裕仁委派其弟秩父宫雍仁亲王,作为其代表访问伪满“首都”新京(今吉林长春,下统称新京)〔图1〕。

雍仁在新京期间,与溥仪共同观看了伪满洲国军队的分列检阅式,并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6月12日,雍仁在宫内府大臣沈瑞麟的陪同下离开新京。6月15日,在大连登船前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中对

1 刘建华:《简述溥仪第一次访日》,《伪满皇宫博物院年鉴2000—2001》(内部资料),第195—199页。

2 溥仪研究会:《溥仪研究》,2015年第3期,封底。

3 王丽杰:《溥仪与裕仁1931—1945年间往来实录》,《“小泉政权后中日关系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9月,第92—102页。

4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National Diet Library)扫描页链接:https://dl.ndl.go.jp/pid/1231850。

5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National Diet Library)扫描页链接:https://dl.ndl.go.jp/pid/1223765。

溥仪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6月19日，裕仁天皇向溥仪发电感谢：

雍仁亲王归还闻蒙贵皇室及贵国官民热诚之欢待，不胜欣喜，朕对陛下于此重表深厚谢意。¹

溥仪亦发答电：

雍仁亲王殿下平安归还，朕闻之深为欣快，称陛下为此特赐亲电，不胜感谢，敬祝圣躬健康。²

溥仪的第一次访日正是为答谢此次雍仁亲王访满而在关东军的要求下成行的。这次访日自1935年4月2日大连上船开始至4月27日回到大连登岸结束，共计25天。其中在东京滞留时间最长（四月六日至十五日），其在东京的活动也是在日诸城市中最密集的，且政治性普遍较强。溥仪在日的主要政治活动，如与裕仁天皇和冈田启首相等的会面都在东京举行。东京市长大塚虎太郎为溥仪来访在东京市内做了大量准备。

三 日方的“奉迎”筹备

溥仪访问日本作为20世纪初以来日本本土首次外国“元首”来访，得到了日方政界的高度重视。相关的基础设施营建、“奉迎”预备措施全部记录在东京市政府（东京市役所）于溥仪访日次年的昭和十一年（1936）三月编纂的《“奉迎”志》〔图2〕³，这也是本文依托的基本史料。本书的发行所寄赠本现保存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其封面为绿色，上绘黄色凤鸟，扉页写有年份、书名、发行机关，共计193页。

本书结构上分为编、章、节三个层次，编章基本结构见表一：

表一

第一编	“满洲国皇帝陛下”御来访记
第一章	“满洲国皇帝陛下”御着京前记
第二章	“满洲国皇帝陛下”御滞京记
第三章	“满洲国皇帝陛下”御退京后记
第二编	东京市“奉迎”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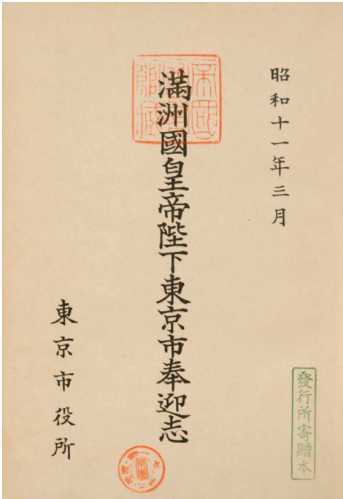


图2 《“奉迎”志》扉页书影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1 张贤达，陈敏：《百年人民大街》，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8年，第142页。
2 同上，第143页。
3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National Diet Library）扫描页链接：<https://dl.ndl.go.jp/pid/123185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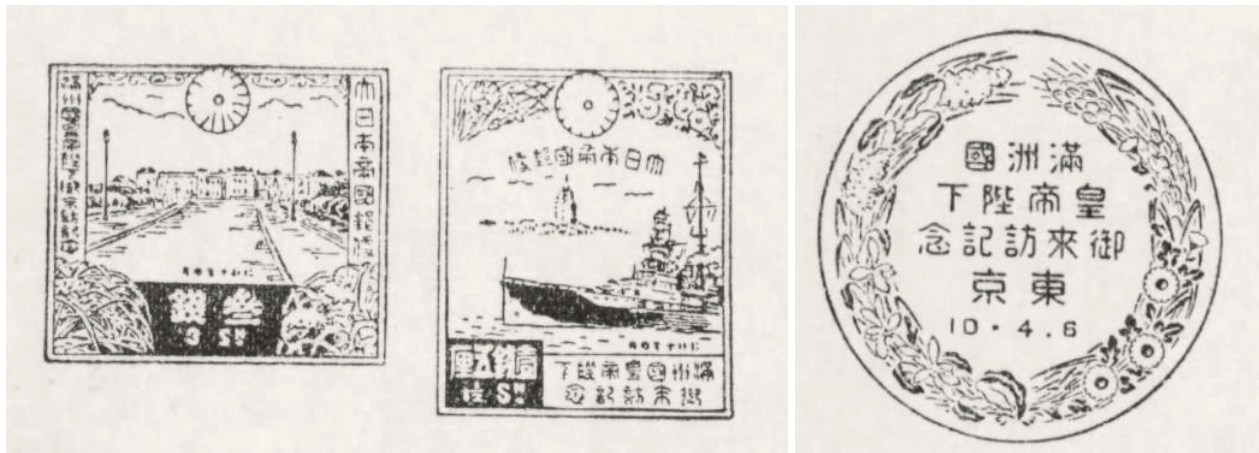


图4 溥仪访日纪念邮票及邮戳

纪念邮票和邮戳〔图4〕。

作为溥仪访日活动中心的东京市政府更是在东京大兴土木，兴修“奉迎”工程，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坐落在东京车站正前方的“奉迎”门〔图5〕。作为溥仪从东京车站下车后看到的第一座建筑，其规制也最为浩大，其形制为中式门楼建筑，高近20米，两门楼顶部分别悬挂日、“满”两国国旗，门楼楼身上分别悬饰“奉”“迎”二字。伴随车队行进方向还有两座矮小门楼，四座门楼构成了东京车站对面的一条中轴街道。除此之外，东京市还在日本桥〔图6〕、上野公园、日比谷公园、隅田公园、银座商业区〔图7〕和东京车站八重洲口布置了大量“奉迎”装饰作为街面点景。

东京市兴建的“奉迎”工程加之配套的道路整修和河道疏浚耗资甚巨，在书中第二编第一章——“奉迎经费”部分记载道，东京市为此次溥仪来访事件专门追加了昭和九年（1934）和十年（1935）东京市基本财政预算。根据昭和十一年（1936）的事后统计，为“奉迎至诚之表示，设施万端整备……二年度经费预算总计十七万八千元（旧日元）”。



图5 东京车站“奉迎”门



图6 日本桥上的“奉迎”装饰



图7 银座地区街道的“奉迎”装饰

除“奉迎”设施外，文部省和东京市还组织了全市的少年儿童参与东京街面的“奉迎”活动〔图8、图9〕，总计参与人数达到一万零六百一十三人。且对少年儿童的队列排布、着装规范、徽章佩戴、行礼方式均做了细致、统一的要求。东京市电车公司还颁发了纪念乘车券〔图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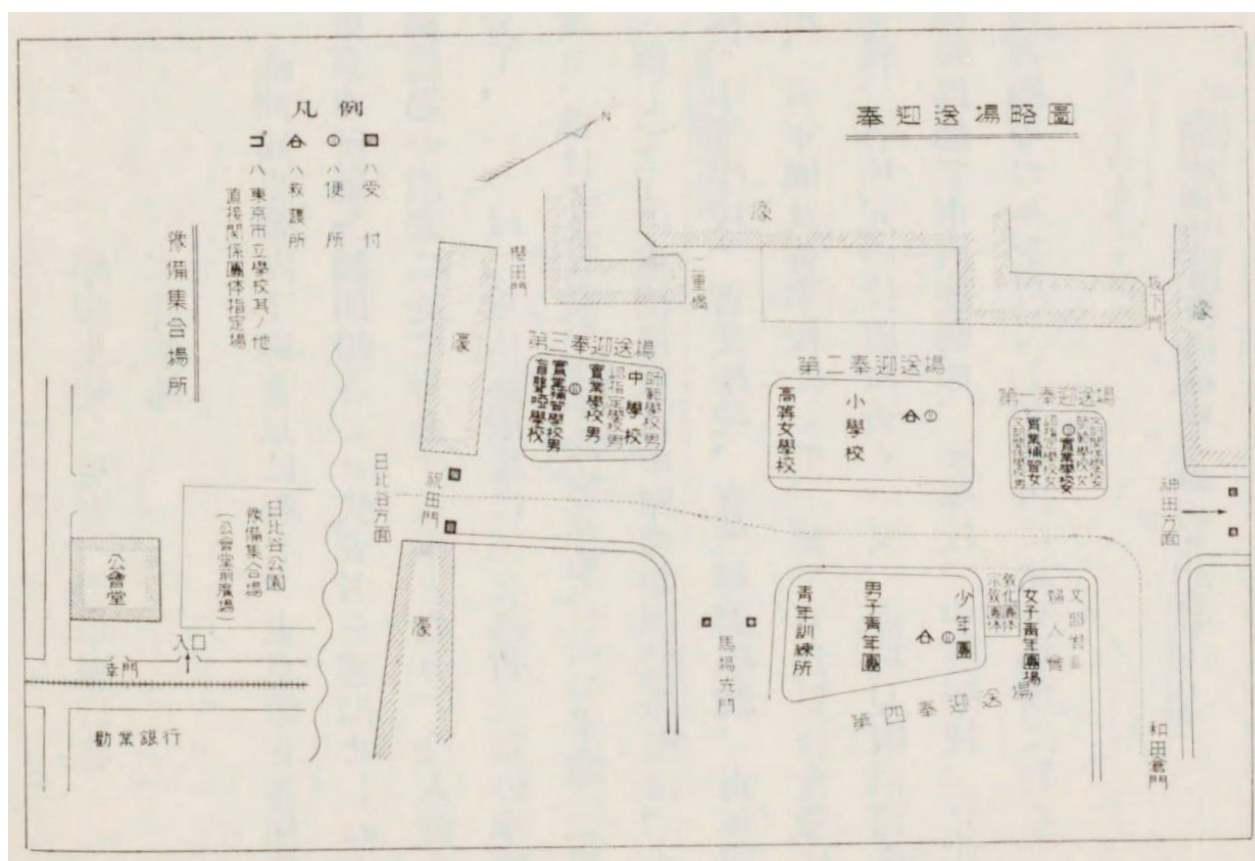


图8 东京市少年儿童“奉迎”式站位安排



图9 东京市少年儿童“奉迎”式纪念明信片



图10 溥仪访日纪念电车乘车券

四 在东京的“皇帝”

昭和十年（1935）四月十日上午九时，溥仪所乘“御召舰”比睿号战列舰进入横滨港，秩父宫雍仁亲王举办了欢迎溥仪登岸的迎接仪式〔图11〕。溥仪于上午十时二十五分正式踏上日本国土，十时四十五分在横滨港车站登上专用列车前往东京，正式开启了为期半月的访日行程。

裕仁天皇和皇后良子也在同日稍晚特地前往东京车站迎接溥仪一行〔图12〕，内阁总理以下各国务大臣、内大臣、警视总监、东京都知事、东京市长及日本驻满公使馆公使以下馆员和在京皇族成员均随同天皇在东京车站迎接。日本陆军近卫和第一、二师团的仪仗队参与了东京车站的礼宾工作。按照日本政府的安排，溥仪被安排在国家迎宾馆同时也是“东宫御所”的赤坂离宫下榻。在抵达东京当日，溥仪和裕仁分别向对方授予了兰花和菊花大绶勋章，这分别是伪满洲国和日本最高的勋赏。《“奉迎”志》按照日期对溥仪在东京每天的活动做了详细记录，特整理见表二¹：



图11 秩父宫雍仁亲王在横滨码头迎接溥仪上岸，远景为“御召舰”比睿号战列舰



图12 裕仁天皇在东京车站迎接溥仪并介绍在车站随同迎接的各皇族成员

1 《“奉迎”志》，发行所寄赠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第22—26页。

表二

第一日昭和十年(1935)四月十日	午前十一时三十分, 溥仪抵达东京车站, 裕仁及日本政界要员在东京车站迎接, 放礼炮, 互授勋章。晚间, 裕仁天皇在丰明殿主持欢迎晚宴
第二日昭和十年(1935)四月七日	午前九时三十分, 溥仪由赤坂离宫出发, 以官币大社的规格参拜了明治神宫, 随后参观了圣德纪念绘画馆。十一时在大宫御所拜访了裕仁天皇之母贞明皇太后, 在正午前后参拜了靖国神社。下午四时东京府知事捧呈“奉迎”文, 四时五十分接见了日本参众两院代表, 五时接见了与建立伪满洲国有关的二十人代表团, 晚六时三十分与雍仁亲王及王妃举行晚宴
第三日昭和十年(1935)四月八日	午前十时,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及各国务大臣来访, 十一时三十分出席驻日公使馆组织的在日“满洲国”人举行的“奉迎”仪式, 午后三时四十分出席茶会, 晚间六时二十分出发前往日本国政府主持的晚宴, 晚宴在内阁总理大臣冈田启介的官邸举行
第四日昭和十年(1935)四月九日	午前九时二十分, 日本天皇和雍仁亲王陪同溥仪在代代木练兵场(代々木練兵場)检阅近卫师团。当晚六时三十分, 溥仪于赤坂离宫主持宴会, 回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及以下各国务大臣
第五日昭和十年(1935)四月十日	溥仪参加了由东京市政府组织的“东京市奉迎式”(图13), 东京市长大塚虎太郎主持, 观看了日本传统的古典歌舞伎表演, 剧目主要有《劝进帐》《红叶狩》。当夜, 溥仪主持在赤坂离宫举行的晚宴, 招待雍仁亲王及王妃、宣仁亲王及王妃、崇仁亲王
第六日昭和十年(1935)四月十一日	溥仪前往大正天皇葬地多摩陵参拜, 午后在赤坂离宫的羽衣厅(羽衣の間)观摩古书画
第七日昭和十年(1935)四月十二日	继续在赤坂离宫的羽衣厅(羽衣の間)观摩古书画
第八日昭和十年(1935)四月十三日	前往陆军第一卫戍病院慰问了伤残军人〔图14〕, 午后继续在赤坂离宫的羽衣厅(羽衣の間)观摩古书画。三时, 前往大宫御所向贞明皇太后告别。五时, 接见日本大藏大臣
第九日昭和十年(1935)四月十四日	天皇和皇后中午在丰明殿举办告别午宴, 午后二时三十分, 天皇前来赤坂离宫答礼, 并正式告别。午后三时十五分, 雍仁亲王亦来送别。晚间溥仪组织晚宴答谢日本政府派遣的以枢密顾问官林权助为首的接待人员团队, 并“下赐”金十五万元, 另赠救恤金七千二百元
第十日昭和十年(1935)四月十五日	午前九时十分从赤坂离宫出发, 雍仁亲王等皇族成员和内阁总理大臣以下内阁官员前往车站送行〔图15〕, 午后六时抵达京都车站, 结束东京行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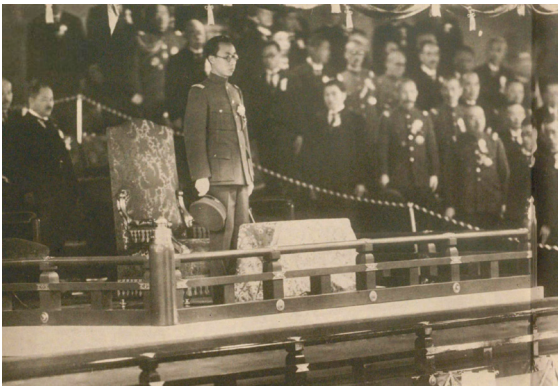


图13 溥仪观看东京市政府组织的“奉迎”式演出



图14 溥仪在陆军第一卫戍病院慰问伤残军人

五 事件影响并结语

溥仪作为前清逊帝，虽然在1925年被冯玉祥驱逐出宫，彻底离开了帝国中枢，但其政治上的符号价值并未随清代灭亡而消散，他作为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其身份成为了其屡次东山再起的政治资本。自其1912年逊位以来，便屡有政治势力试图利用溥仪的影响力达成自身派别的政治目的。1931年年底，溥仪在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帮助之下潜赴东北，次年2月18日，伪东北



图15 雍仁亲王在东京车站送别溥仪

行政委员会发布所谓《独立宣言》，之后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所谓“执政”。溥仪在张勋复辟的十五年后再次成为所谓“国家元首”。但溥仪对伪满未能施行帝制始终耿耿于怀，终于在1934年，伪满重施帝制，溥仪的“皇帝”梦得偿所愿。与此同时，日本派出在军政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秩父宫雍仁亲王前来祝贺，其在皇道派军人中享有很高威望，在驻满的关东军中更是地位瞩目。在这一背景下，溥仪也自然乐得东渡日本访问，以期提高自身的威望，提升其在伪满政治框架内的实权。此时溥仪的来访，也为当时正在被国际联盟出台的《最终报告书》搞得国际形象大损的日本政府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筹码，日本给予溥仪极为超然的政治待遇，天皇亲自接站的待遇甚至超过之后的1941年同为国家“元首”的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来访¹。应当讲溥仪此次访日所受的极高礼遇是日本政府和其双向奔赴的必然结果。作为溥仪访日期间滞留时间最长的城市，同时也是举办大部分政治活动的东京市，承担了溥仪此访的大部分接待和筹备事务工作，参与“奉迎”活动所耗费的资金和动员的人力均可谓巨大，其活动内容政治性、文化性兼而有之。

在溥仪访问东京过程中，日方一系列的接待活动虽然表面上体现的规格极高，但实际这些表面隆重的接待活动都是为了日本加强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而服务。日本希望通过这种接待方式加强伪满洲国的合法性，向国际社会展示其在东北地区的统治是得到当地“政府”认可和支持的。通过给予溥仪高规格的待遇，日本试图进一步加强对伪满洲国的控制，同时也借此机会增强对中国华北等地区的影响力。同时，这样的接待也是一种心理战术，意在向中国人民展示日本与伪满洲国之间的紧密关系，塑造所谓“日满亲善”的假象，从而达到削弱中国人民抵抗意志的目的。

笔者希望通过拙作梳理溥仪在东京十日的行止，尽最大可能客观、明晰地重现溥仪在东京的各类活动，为后续研究提供研究依据和思路，也为从更广角度审视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提供材料。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

¹ 笔者注：1941年6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访问日本，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率各国务大臣在东京车站迎接。